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人文论丛

罗义群 著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

MIAOZU NIUCHONGBAI WENHUA LUN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

罗义群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罗义群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8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79-3

I. 苗… II. 罗… III. 苗族—牛—圣物崇拜—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952 号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236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60.00 元(本册定价 20.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彩图1 “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是《诗经·七月》中的名句，意即“举起高高的牛角酒杯，祝老爷万寿无疆！”“兕觥”在中原大地早已消失殆尽，而贵州苗寨却比比皆是。（顾贻先 摄）



彩图2 “鼓社祭”——苗族最盛大的节日。（李显波 摄）



↑ 彩图3 “鼓社祭”场景之一，右二为第一鼓主，是先祖的象征，右一为第二鼓主是宗族的代表。（李显波 摄）



↑ 彩图4 苗族“鼓社祭”祭仪之一踩塘。（吴正彪 摄）



彩图5 “牯脏牛”是“美男子”，是“伟大夫”，它用生命换取了全宗族的平安与幸福，显示出生命的悲壮与崇高。(李显波 摄)



彩图6 在巫师的祈祷声中，牯脏牛背负着宗族的希望，走进另一个世界。(丁新成 摄)



彩图7 清水江上的龙舟节 (吴明 供稿)



彩图8

清水江上的牛角龙 (吴明 供稿)





彩图9

苗族歌唱家阿幼朵把牛崇拜带到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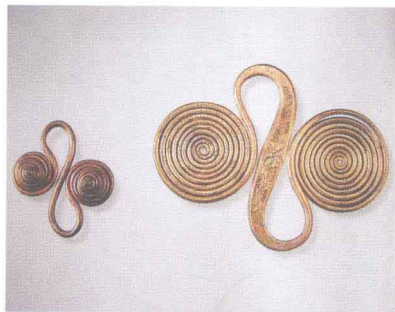
(杨政平 供稿)



彩图10 凯里南花苗寨一角 (李昱波 摄)



彩图11 牛角形银耳环 (龙军 摄)



彩图12 牛旋纹银背牌 (龙军 摄)



彩图13

贵州三都县普安乡苗族姑娘头顶三叉龙纹银角。





↑ 彩图14 贵州六枝特区梭戛乡，女子绾发髻，插长角木梳，将假发呈“∞”形缠绕木梳上。



↑ 彩图15 贵州纳雍县百兴乡，女子绾发髻，头插牛角形红漆木梳。

↑ 彩图16 贵州织金县龙场乡，女子绾髻，头顶插一柄2厘米长，状如牛角的白木梳，将重达1000克的假发缠于梳齿上，露出梳角。





彩图二

贵州六枝特区新场乡，女子头戴翅角木梳。



彩图三

贵州清水江流域苗家堂屋里的牛角具有明显的祖灵意象，可以《在宗子孙》、《佑启后人》。（刘公孚 供稿）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

刘守华

罗义群先生的《苗族牛崇拜文化论》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被它所展示的苗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丰富知识所深深吸引，便先将自己的一点读后感写出来作为此书的引言。

此书是关于苗族牛文化的一部专论。而对牛的崇拜与亲和，实际上是遍及全人类的一种普泛文化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的脚步迈进工业文明时代十分短暂，在农业文明时代却渡过了漫长的岁月，而牛就是人类从事农耕的最重要的助手和伴侣。这种情形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学人热衷于龙文化、虎文化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为众人所赏识的学术成果。我以为就历史积淀之丰厚和渗透力之强劲而言，它们却远远不及牛文化。仅就我随手翻检所及，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包容宽广的大型类书中，所辑录的关于牛的古典文献资料，就达六卷近千条，从《周易》、《礼记》到《诗经》、《山海经》；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到《搜神记》、《太平广记》；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到李白、苏轼的诗词，处处都活跃着牛的身影。下面是从柳宗元的《牛赋》中摘取的一段：

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月，豆，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已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臛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

物无逾者。

这位生活在一千多年前著名文学家的《牛赋》既是一篇以牛喻人、意味隽永的寓言，又饱含着对牛的深情赞誉。“富穷饱饥，功用不有”、“利满天下，物无逾者”，和近现代中国人对牛的感受岂不是心心相印么？

放眼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从田单以火牛攻燕到老子骑青牛传道，从骑牛放牧的古典诗画到“甘当老黄牛”的现代哲理，从牛郎织女的民间口头传说到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西游记》故事，等等，这些事相组织起来，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大典。

写到这里，似乎离开了本篇序文所要评论的《苗族牛崇拜文化论》。恰恰相反，正是基于我对中国牛文化的上述粗略理解，我才更深切地认识到这部专著的特殊价值。

正如本书所告诉我们的，牛崇拜文化贯穿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之其他民族更鲜明突出，更有自己的特点。人们不仅十分尊重喜爱牛，以至于在过节时，用第一份糍粑祭祖宗之后，接下来就是用第二份糍粑喂牛，平时完全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安排牛的生老病死，而且对牛的尊崇达到神圣化的地步——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以模仿牛的声音体态为美好吉祥的标志，以致于老人临终时最关心的不是有没有棺材，而是有没有水牯牛致祭。因为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就是杀牛祭祖的“鼓社祭”。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事实，从祖灵意象到生殖崇拜，从农业生产到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给予条分缕析，充分证实了牛崇拜在苗族文化中的突出地位，给人以深刻印象。

本书并不满足于罗列苗族牛崇拜的种种文化事相，作者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剖析了这些文化事相的深沉内涵与成因。如书中写道：“蚩尤战败，子孙西迁，不曾带走中原的一粒沙、一根草、一片云彩，但却带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念，带走了古老的殷商文化并把它保留在山的皱褶之中。”苗族的牛崇拜实为怀念先祖蚩尤的古老文化遗存，这是从历史的纵深处去追寻文化之根。作者还吸取了西方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的有关理论来破译这些文化之谜，如借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